

## 文学、历史与读者：希伯来《圣经》研究的进路(前言)

黄薇 李炽昌\*

与《旧约》或《塔纳赫》这样的术语相比，希伯来《圣经》这一术语更受现代圣经学者的青睐。原因在于，比起前两者所带有的基督教与犹太教色彩，后者以该文本主要使用的古代语言来界定概念，更加符合现代学术追求的中立态度。而对希伯来《圣经》文献性质的定义，在很大程度上与解读该文本的诠释方法密不可分。采用神学的诠释方法，该文献就可以被定义为基督教经典或犹太教经典；采用文学批评的方法，该文献就是一部古代文学作品；采用历史批判的方法，该文献就是史料。不过，在现代圣经学者眼中，这三种对于希伯来《圣经》文献性质的定义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因此，也没有任何一种诠释方法是绝对的。应当说，任何一种诠释方法实际上都是处境化的，都取决于读者对文献性质的接受，以及他们的社会文化定位。

本辑共收录研究文章 14 篇，以希伯来《圣经》文本研究为主。当中既包括较为宏观的思想观念研究，也有细致的文本分析。总结来看，文章多采用历史的视角，它们关注一些共同的核心议题，就是希伯来《圣经》中大多数书卷所面对的生存现实：失去应许之地的危机、圣殿被毁、北国以色列（公元前 722 年）与南国犹大（公元前 597 年）的最终陷落所导致的著名的“巴比伦之囚”（公元前 586 年）。毫无疑问，在众多《圣经》书卷中都可以看到，作者为以色列和犹大的失败报以哀叹，用泪水表达他们的绝望。《耶利米书》和《哀歌》中所表达的悲伤之情便是两个最经典的例子。被掳他国失去故土的经历促使上帝的子民进一步反思罪恶、惩罚和苦难等主题，这既是希伯来《圣经》的主要特征，也是后来犹太教和基督教主要的思考及关注重点，后代读者在历史长河中仍然还会不断遭受苦难，并且通过反思他们的苦难经验，在最为沮丧的情况下找到前进之勇气与力量。然而，确信会得到宽恕和接纳、获得救赎的观念也占据了中心舞台，但除了信仰及观念上的支持外，历史上实际的回归、复兴、重建构成了硬币的另一面。《圣经》中更多

\* 黄薇，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讲师；李炽昌，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教授。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8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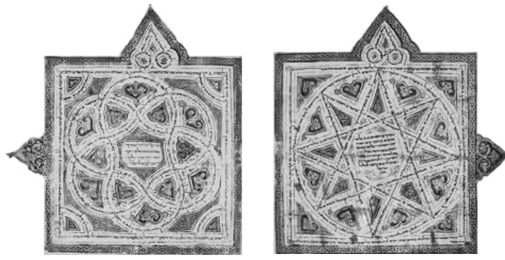
的篇幅和段落明确阐述了这些有关复兴和重建的主题。

与回归和重建主题密切相关的,是对于自我身份的追求,这既包括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也包括本族神与其他神的关系。例如,田海华的文章便探讨了《摩西五经》中上帝与诸神的问题,也就是耶和华上帝与其他神的关系问题;亨德尔与黄薇的文章都探讨了自我与他者的议题,考察古代以色列与其他群体的关系,既有观念上的也有历史上的;姜振帅的文章通过分析回归复兴的历史背景,指出《圣经》后期编者对早期西奈山传统的再利用。

所有解读《圣经》的文章,无论是关注解读某些个别章节,还是整体上解读《圣经》正典,几乎都需要或明确或隐含地采用某种阅读与诠释方法。希望读者能够在本辑文章中看到当代释经方法的应用。在本-兹维的文章中我们将会关注诠释过程中的读者。布伦纳-伊丹的文章从现代读者视角出发,对《路得记》做出与传统理解完全不同的新诠释。而亨德尔采用了一种比较人类学的方法,对照解读《圣经》和中国神话经典《山海经》。黄薇与田海华的文章都采用了学术界在过去一个世纪最为常见的历史批判方法,并从文化记忆的角度分别处理了先祖材料和五经传统。在姜振帅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传统-历史方法的运用,讨论的是《圣经》中的西奈山与锡安山两个圣山传统之间的内在关系。孙玥结合古代西亚的文献背景,针对《以西结书》中对于推罗王的描述进行再诠释。就诠释史而言,哲学的方法同样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特别是犹太哲学家迈蒙尼德,张缨的文章主要处理的便是迈蒙尼德所代表的圣经传统。与之类似,曹坚的文章采用了历史的视角,对中世纪的犹太历史文献进行归纳整理,以此来描述中世纪犹太人对于历史的认知。

埃胡德·本-兹维的文章以《希伯来〈圣经〉的一些思维习惯:对不同历史形态的犹太教之影响》为题,展开对希伯来《圣经》思维习惯的讨论。他指出,无论是犹太教还是基督教的读者,在年复一年阅读经文的过程中,由于社会地位、文化背景以及知识视野上的差异,他们阅读经文的方式也会千差万别。近十年来的学术研究特别关注在跨越时间和空间维度下《圣经》文本的接受史。当然,就希伯来《圣经》而言,历史上不同形式的犹太教都将此文本作为最根本的正典文本。尽管无法在一篇文章中穷尽所有的诠释方法并展开分析,不过,本-兹维关注的是希伯来《圣经》所要传达的思维习惯,或者说,是对后世犹太教的形成发挥重要作用的思想前身。

希伯来《圣经》中的大多数书卷都是对过去的塑造,读者通过阅读进而共享书卷中对于过去的记忆。当然,这些记忆中的过去并不是完整及全面的,记忆会因读者的处境不同而关注某些特定时期、特殊事件及重要人物。本-兹维的文章首先指明,第一种思维习惯就是对于历史溯源之想象和记忆。对犹太人而言,最



重要的时间、人物和事件就是走出埃及事件和后续在旷野漂泊不定的生活回忆，这当中最具核心意义的事件是以色列在西奈山获得《妥拉》传统，该事件最终以在旷野建造会幕达到叙事高潮，会幕可以被看作耶路撒冷圣殿的模型。在这个记忆中，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耶和华的应许。旷野生活中的以色列总会行差踏错，违背耶和华的诫命，因而常常受到耶和华的惩罚，导致灾难降临。但是，耶和华的应许却是永恒的，在惩罚以后耶和华最终会赦免以色列。希伯来《圣经》所塑造的过去，就是这样以螺旋式的形态循环发展的。并且，以色列在旷野中背叛耶和华的命令，以及耶和华的宽恕，最终产生了对于未来的一种想象，即以色列不会再背叛耶和华的话语、违背耶和华的教导。旷野时代的生活也将耶和华塑造成以色列的王，其承载着一般王权观念的特征，包括是位军事将才，是立法者、礼仪中心的建立者，对其臣民恩威并施。最重要的是，这为希伯来《圣经》的读者建立起一个最根本的观念：以色列的王不是摩西，甚至不是人类，而是耶和华。这成为希伯来《圣经》对于以色列历史的元叙事，是历史上每一个当下时刻的犹太群体跨越时空对于过往的根本记忆。

当犹太群体面对灾难的时候，通过回忆（或重现）过去曾经发生过的灾难来理解分析当下的情境是本·兹维文章所探讨的第二种思维习惯。每年的逾越节晚宴是必不可少的对于灾难事件的纪念。耶路撒冷圣殿遭到毁坏，是在希伯来《圣经》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灾难事件。在对于灾难的记忆中，古代以色列要为自己所遭受的灾难负责，他们违背耶和华的教导，因此耶和华要将灾难降到他们头上。可以说，希伯来《圣经》具备很强的教化意义，一方面要求其读者能够遵循上帝的教导，另一方面也警告他们违背上帝旨意的后果很悲惨。因此，摩西作为传达耶和华教导的以色列民众的中介，是一位必不可少的宗师，以色列民众需要摩西式的继任者继续作他们的宗师，这就是犹太教传统的“拉比”，他们成为以色列律法一代又一代的守护者。耶和华的教导和律法正是希伯来《圣经》的核心文本——《妥拉》，是以色列群体的记忆核心。第三种思维习惯是《妥拉》的多义性和开放性，这种思维习惯并不追求单一的、明确的声音，或者形式上的逻辑一致性，而是将《妥拉》的智慧理解为各种互补声音的整合。另一方面，这种思维习惯围绕《妥拉》的核心地位展开，因而促使社会和文化资源集中到对《妥拉》文本的抄写、阅读、朗诵及解释上。相较于被毁的圣殿，经文反而是超越时空的智慧。因为它们不仅与所描绘的世界有关，而且与所有时代都有关，即《诗篇》第78章第6节所言的“将要生的后代子孙”。这样的思维习惯要求读者严格遵守《妥拉》（律法/教训），而这正是对耶和华教导的遵守，并且，遵守《妥拉》并非出于获取个人利益的考量，而要将其作为神圣的诫命。最后一种思维习惯是对希望的坚守。事实上，这种思维习惯与前面提到的对于灾难的记忆是相辅相成的。对过去所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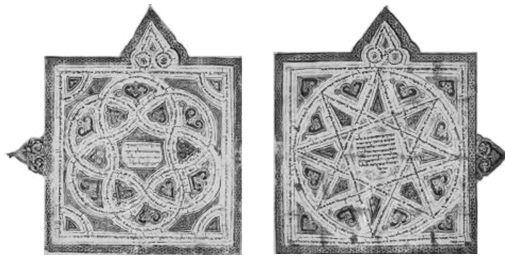
第18辑

遭受灾难的记忆与对未来的希望分不开。记得在埃及受到奴役，才会记得从为奴之家被释放的经验，才会重视《妥拉》的意义；记得耶路撒冷圣殿被毁，遭到流放，才会记得终有一天将会回归，并将其看作第二次走出埃及。先知文学记得以色列犯罪，耶和华因此才会以流放的形式来惩罚以色列。所有这些对过往苦难的记忆也都伴随着对乌托邦式未来的希望。耶和华的应许是永恒不变的，是终将实现的。

布伦纳-伊丹的文章《作为外来劳工的路得与族外婚政治》从当代读者视角，提出了与《路得记》传统解读完全不同的新颖诠释。当前全球普遍存在从次发达地区向较发达地区输入劳工的现象，外来劳工出于各种原因选择跨出国境，承担风险，往往从事处于社会底层的低报酬工作，以改善他们的生活。当代犹太人占多数的以色列社会，在文化上是高度封闭的，外来劳工融入当地社会，面临宗教、语言等一系列文化因素带来的障碍。正是受到以色列现实社会处境的启发，布伦纳-伊丹重新解读了《路得记》，因为与现代以色列社会中的单亲女性外来劳工类似，路得是从其他语言文化区（摩押）来到古代以色列社会的一位女性。在《路得记》中，路得在丈夫死后向她的婆婆拿俄米表示效忠，她到田间辛勤劳动，听从拿俄米关于投靠波阿斯的计划。因为她们都明白，外来女性若想要融入当地社会，只能通过婚姻并生养子嗣来实现。当波阿斯表明将迎娶路得的时候，经文将路得与另外三位族长故事中的外邦女子相提并论，即拉结、利亚和他玛，这意味着路得最终融入“以色列家”。然而，布伦纳-伊丹进一步指出，拉结、利亚和他玛三人都称不上楷模，拉结与利亚因嫉妒争吵斗争，导致她们的儿子也是如此，至于他玛，最后犹大也并未与之结婚。这说明外邦女子即便积极接受当地文化，恐怕仍然很难被完全接受。并且，路得在故事最后一个叙事场景中，即在给儿子取名的场景中彻底消失（《路得记》4:14—17）。因此，路得的故事是一个来自社会底层、没有财产的外邦女子的故事，与其说路得最终融入了当地社会，不如说当地社会吞并了路得。她的困境，与今天以色列和其他地方的外来女工的困境是可以类比的。将这两个案例相互对照，对其进行跨文本阅读，能够帮助我们增加对两者的理解。

罗纳德·亨德尔的文章《〈圣经〉与〈山海经〉中的巨人族：一种比较人类学研究》尝试借用巴西人类学家爱德华多·维未洛斯·德·卡斯特罗（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的“视角人类学”（perspectival anthropology），对自我与他者间的关系及表现进行一种跨文化比较。通过对照，能够更充分地认识每种文化的一些独有特征，及其共有的实践活动。亨德尔相信，所有视角，无论古今，都可能开启一场相互尊重且具有启发和批评意义的对话。

亨德尔的研究关注了两个文本对巨人族的记载：一个是希伯来《圣经》，另一



个是中国古代典籍,于公元前 4—前 1 世纪写成的《山海经》。《山海经》描述了一个神秘的想象世界中的山川景观,包括历述东南西北中群山风貌的《山经》和罗列四海方国的《海经》,同时也是一部记录旅行见闻的寓言集,展现出光怪陆离的异人怪物。那些想象中的远方世界是非我族类的蛮族之地,这一图景正是对中心文明世界与边缘野蛮世界的区隔。在对这些异域他者的想象中,北方和南方居住着若干巨人族,比如博父国、大人国。文中描写居住在那些国度的人都很高大,“其为人大”(《海外北经》《海外东经》);在东海之外的大荒之中,“有大人之国,有大人之市”(《大荒东经》);东北海之外,也有“大人之国”(《大荒北经》);“南方有赣巨人”(《海内经》)。在《山海经》的这些记录中,部分巨人族具有一些文明行为,例如某些巨人族以黍为食物,某些巨人族制造船只等。应当说,《山海经》中的巨人族对人类世界是不具备威胁性的,是勤劳的,但同时也是滑稽可笑的。若仔细阅读南方赣巨人的记载,“南方有赣巨人,人面长臂,黑身有毛,反踵,见人笑亦笑,唇蔽其面,因即逃也”(《海内经》),亨德尔指出,这当中具有明确的视角特征。在中心文明世界的视角中,赣巨人好像猿猴,他们见人笑也跟着笑,长唇能够遮住面部,这突出了巨人族滑稽可笑的一面。然而,人们见到他们也想要逃走,这又说明文明人惧怕巨人族。反过来,在巨人眼中,文明人也是可笑的。在这种镜像视角中,双方都将对方看作异域怪物。《山海经》的这种反思性显示出一种本土人类学,尽管自我与他者在身体、地域及文化程度上有所不同,但双方存在认知与情感上的相似性。而这种对比又似乎暗示文本写作背后所具有的帝国结构,文明人与异族人和平共存在一个有序的、以中心—边缘为文化结构的等级空间中。东周末期的战国时代,社会动荡,中原各诸侯国扩张兼并,一些其他民族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各诸侯国不断面对对异质多样文化的融合,这也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化逻辑。巨人族作为文化融合的混血儿,并非需要被彻底消灭来为文明让路,他们可以与文明人合法共存,居住在神话空间,位于“天下”的边缘之地,从而封闭在更大的秩序中。《山海经》因此成为一部提供有关遥远异域之地文化信息的作品。

再看希伯来《圣经》的记载,在以色列人到来之前,巨人族就生活在迦南地。以色列人第一次遇到巨人族发生在摩西进入迦南之前,摩西打发探子窥探迦南地,探子回来禀报摩西,称住在那里的人强壮、身量高大,并称他们是亚纳族人,是伟人的后裔,“他们看我们如同蚱蜢一样”(《民数记》13:27—28、30—33)。此处同样存在一个视角的观察,以色列人通过巨人族的眼睛反观自身。只不过与《山海经》不同的是,这里的巨人族不是滑稽可笑的,而是具有威胁性的。在以色列人的想象中,希伯伦的巨人可以轻易打败他们。实际上,希伯来《圣经》使用了若干名称来指称迦南的巨人,例如此处的“伟人”(גִּבּוֹרִים)、 “亚纳族人”(בְּנֵי אֲנָק),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8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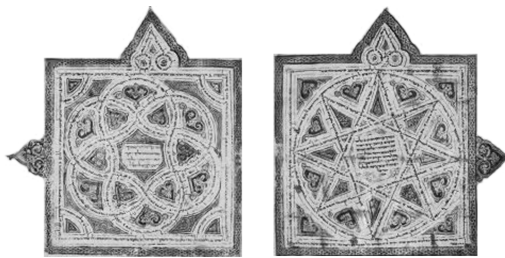
此外还有“利乏音人”(לִיפְיִימִים)、“亚摩利人”(אֲמֹרִי)等。根据《创世记》所记,在大洪水以前,“伟人”是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所生的后代,都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创世记》6:4)。这种半神半人的形象可能与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中英武有名的国王吉尔伽美什很相似,根据赫梯语版本,吉尔伽美什有5米高。

之后,摩西强调耶和華会灭绝这些巨人,将亚衲族人制伏在以色列人面前(《申命记》9:1—3)。《阿摩司书》也描绘了一段类似的图景,耶和華将除灭那些高大如香柏树一样的亚摩利人(《阿摩司书》2:9—10)。这些文本力图说明以色列将征服迦南,获得应许之地,实现出埃及的救赎和耶和華对以色列人祖先的应许。然而,真正击败亚衲族人的是摩西的继承者约书亚所带领的军队,战争结束后,还有一些幸存下来的亚衲族人留在迦萨、迦特和亚实突(《约书亚记》11:21—22),他们就成为后来大卫王击败的非利士人。《撒母耳记下》第21章第15—22节记载大卫的军兵杀死了四个伟人的儿子,其中一个是迦特人歌利亚。不过,在《撒母耳记上》第17章的记载中,是大卫杀死了非利士人的武士迦特人歌利亚,并且经文描写歌利亚身高六肘零一虎口,即3米左右。在大卫的视角中,歌利亚虽然高大,却是未受割礼的野蛮之徒,大卫将歌利亚比作狮子和熊(《撒母耳记上》17:43)。约书亚击败亚衲族人后,大卫为以色列杀死了最后一位巨人歌利亚,实现了耶和華必灭绝迦南的巨人的说法,从此开启了大卫王朝。在以色列人的自我建构中,巨人族属于过去的时代,他们的命运就是被击败。

与《山海经》对巨人族的记载对照来看,华夏民族占据世界的中心,巨人族则居住在遥远的边缘地区。这种中心与边缘的空间关系是由帝国秩序决定的,其中的文化逻辑将巨人族定义为滑稽可笑的异邦民众,他们在空间框架中位于边缘。然而,在希伯来《圣经》中,巨人族原本就居住在世界中心,以色列人反而是作为边缘民族来到历史舞台上的。在希伯来《圣经》的文化逻辑中,以色列的兴起才是历史转折点,巨人族只在以色列到来之前短暂地居住于世界中心,他们注定是要被灭绝的,这样巨人族在时间框架中位于边缘。

另外,中国和以色列还拥有共同特征,即在两者的文化遗产中,都存在巨石遗迹,其代表对于巨人族留存在地貌上的一种记忆。在中国东北地区,特别是在辽东半岛发现了许多大约公元前2千纪的巨大石棚墓葬。朝鲜半岛也有许多巨大石棚遗迹。在以色列北部及约旦河西岸,也保留下来一批大约源自公元前3千纪,即青铜时代早期的巨石遗迹。对于铁器时代的人而言,这些巨石遗迹极有可能被认为是古代巨人留下的。

通过这样的对照,每一种文化都具有对陌生世界的某种类型的想象。在这些想象背后,是政治和宗教的观念在起作用,中国是天命观,以色列是被拣选的立约的人民。两者对于巨人族的不同想象是各自文化自我构建的方式。视角人



类学也能够阐明现代思想。现代人往往对巨人族的存在抱有怀疑,这正是韦伯所谓理性主义进程对于“世界的祛魅”。而这一进程在古代中国和古代以色列都曾有过先例。对于《山海经》所记载的异邦怪物,汉代史家司马迁在《史记》中表示“余不敢言”。这表明,史家追求的是一个没有神话,可观察、可经验、可验证的对于异邦的认识。类似地,对于《圣经》中巨人族的记载,公元1世纪亚历山大的斐洛认为不能将其按字面意义去理解,摩西是想要表达这些人身材异常高大。后世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许多传统释经者都沿用斐洛的理性方式去解释经文。尽管在现实世界我们再没能看到巨人族的存在,但是存在于古代经典文本中的巨人族丰富了我们的文化地图和谱系。

黄薇的文章《〈创世记〉先祖叙事中的文化记忆》同样关注了以色列自我身份认同与他者群体的关系问题。该文以《创世记》中的先祖叙事部分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从亚伯拉罕开始的家族故事进行分析,来考察以色列群体的形成。先祖叙事对“以色列”自我身份的构建,与其对以色列周边群体的描述是分不开的。换句话说,先祖叙事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构建出以色列与其周边群体的社会地缘关系。同时,先祖叙事对以色列共同体的定义也成为后来以色列民族的集体记忆。

尽管圣经学者曾经尝试通过先祖叙事还原历史上的先祖时代,然而现有史料表明,要还原历史上的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事迹是不可能的。这并不意味着先祖叙事的记载都是毫无历史根据的臆想。这三代先祖的故事,包括对以色列周边群体的记录,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铁器时代以色列民族形成时期黎凡特地区的社会组织和地缘政治格局。《创世记》先祖叙事中存在南北两个传统——代表南国犹大的亚伯拉罕传统、代表北国以色列的雅各传统,其在以色列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被整合在一起,成为共有的文化记忆。

亨德尔及黄薇的两篇文章揭示出《创世记》中两个相对独立却又密切相关的叙事体系。通常认为《创世记》第1—11章是对远古时代的神话记述,第12—50章是对先祖时代的历史记载。当然,这两个文学叙事体系有各自独特的文本来源、中心议题和视角。但是,这两部叙事作品一并被放置在《创世记》这一书卷中,它们共同关注的是对以色列身份寻找,他们的身份要以存在于遥远过去的群体、生活在边境或居住在他们中间的群体为参照。并且,这种对于自我和他人的视角是互动形成且不断转化的。

田海华的文章《五经中的上帝与诸神》同样处理了以色列宗教史发展过程中有关上帝与诸神的观念,特别关注了《摩西五经》(《妥拉》)的祭司典与申命典中西奈启示对于以色列宗教的意义)。该文以传统的来源批判为理论基础,以四底本说为展开讨论的基本架构,分别考察了耶典、神典、申命典与祭司典中有关上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8辑

帝和诸神的一系列观念,指出四底本对上帝的特点和属性持有不同观点,上帝与其他神祇的关系也有所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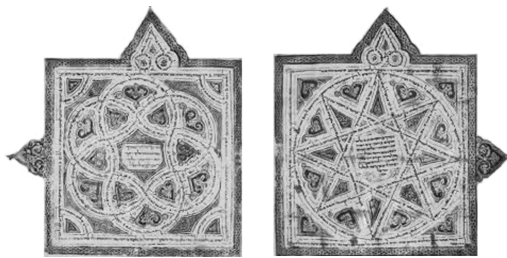
从文化记忆层面来看,耶典模仿并转化了亚述帝国的思想观念,反转当下的政治力量,使得雅威成为所有民族的原初神。神典则将雅威崇拜局限在以色列民族中,同时默认其他民族神祇的存在。申命典强调雅威崇拜的中央化,取缔地方性圣殿,禁止其他形式的偶像崇拜。作为最晚成书的祭司典,其认定除雅威之外,没有别的外邦神祇,没有神的使者,没有天象,由此走向一神论的宗教新时代。

对于西奈山的记忆,申命典以摩西之口重申雅威与以色列之间的立约关系,祭司典将西奈山上的神圣显现化为上帝的“荣光”,以一种革新的历史记忆教导以色列人遵从圣洁的宗教愿景。正是在祭司典与申命典作者笔下,一神论成为以色列宗教的显著特征。

姜振帅的文章《圣山的兴起:希伯来〈圣经〉中的锡安山与西奈山历史传统》探讨了希伯来《圣经》书写中两处非常重要的山脉及其所象征的两个传统。这两座山分别与两位英雄即摩西、大卫密切相关,西奈山传统和锡安山传统后来发展成摩西律法传统和弥赛亚锡安传统。这两个主题一起构成了旧约《圣经》的核心部分,值得进行更广泛和更深入的探讨,并且也极大地影响了对希伯来《圣经》的诠释。

姜振帅的文章主要对这两个传统的关系及发展做出了解释。西奈山是以色列获得耶和華启示的地方,也是摩西从耶和華那里获得律法的地方。西奈山传统与出埃及叙事关系密切,发生于以色列的旷野生活时期。锡安山则与耶路撒冷的圣殿联系在一起。从希伯来《圣经》叙事的时间线来看,锡安山传统晚于西奈山传统。然而,两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更为复杂。就其观念来看,锡安山传统更强调耶路撒冷及其圣殿的重要性,或者说锡安山对于耶路撒冷这座城市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耶和華居住在锡安山,并且在锡安山上,耶和華守护着耶路撒冷圣城及其民众。锡安山与耶路撒冷关系密切,说明该传统源自晚期犹大地区的语境。

再看西奈山传统。只有在《摩西五经》文本中,西奈山传统才与耶和華赐予律法的事件联系在一起,西奈山是以色列与耶和華立约的地方,在《摩西五经》以外的经文中,西奈山与律法、立约这些重要事件的关系并不明确。甚至在波斯早期的祭司典文献中,西奈并不是山,只是旷野的代名词。这些文本证据说明可能有一个很古老的、独立存在的西奈山传统,耶和華曾在此地显现,但西奈山并未同律法、立约这些事件联系起来。随着以色列宗教的发展,西奈山传统才与耶和華的律法、旷野生活,甚至出埃及叙事联系在一起。



对耶路撒冷及其圣殿的重视是建构锡安神学的关键,耶和华在锡安山圣殿守护着耶路撒冷的城墙及其居民。然而,新巴比伦帝国在公元前6世纪,对耶路撒冷及其圣殿的毁灭给锡安山传统带来严峻挑战。因此,从以色列宗教史发展的角度来看,锡安山传统需要变革以应对挑战。在前流放时期的观念中,锡安山是耶和华的居所,自流放时期开始,鉴于新的历史环境,回到锡安山甚至回归的观念都与以色列走出埃及的历史叙事联系起来,对流放后回归的盼望代表以色列再一次走出埃及,锡安山与耶和华的关系也更为密切。这种观念的转变在对《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及祭司典和申命典的文本分析中都可以观察到。由于耶路撒冷及其圣殿被毁,最终在巴比伦之囚晚期和波斯早期,西奈山传统整合了耶和华与以色列的立约传统,成为与锡安山传统并行的另一个传统,呈现在目前的希伯来《圣经》书写中。

本书另外还有一篇侧重希伯来《圣经》文本和历史的文章《边界和秩序:〈以西结书〉28:11—19 中关于推罗王的神谕》。其作者孙玥注意到,两个文学意象——“基路伯”和“宇宙山”对理解关于推罗王的神谕有重要意义,就此展开分析。其中“基路伯”用来描述推罗王,孙玥根据历代释经学家对“基路伯”的考证,结合古代西亚的图像学证据,提出“基路伯”作为推罗王的形象,代表边界的守卫者,职责是分清人神界限,维护上帝作为唯一统治者的王权身份。“宇宙山”就是“上帝的圣山”,根据古代西亚构造的世界图景,这里是世界的中心,代表上帝所维系的宇宙秩序。《以西结书》利用这两个意象说明人神界限和宇宙秩序的重要性。

张纓的文章《〈迷途指津〉的双焦点之一:初探迈蒙尼德的“开端论”》讨论的是迈蒙尼德对《圣经》文本的犹太解读,迈蒙尼德在《迷途指津》中的解经基于犹太教信仰,并且采用了更为哲学化的方法。《迷途指津》是一部针对希伯来《圣经》的解经著作,对犹太教信仰进行了理性化塑造,并将希伯来《圣经》中隐藏的知识揭示出来。迈蒙尼德在对创世开端进行解读的时候,借用了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使用的哲学概念,在本体论基础上探讨世界的起源问题。该文指出《迷途指津》还将“开端”指向“律法的开端”,指出与上帝创世一样,上帝启示摩西赐予他律法也是出于上帝的“目的和意志”,而“律法总是倾向于顺应自然”,是自然构成了律法的尺度。这也就是迈蒙尼德所说的“开端论等于自然科学”。

曹坚的文章《中世纪犹太人的历史书写与认知活动》以历史视角审视中世纪犹太人的历史书写活动。文中列举大量代表人物及其作品,还包括对宗教仪规和敬拜仪式的梳理,并尝试通过分析这些历史著作来探讨中世纪犹太人对于历史的认知。文章指出,中世纪犹太人在数百年里经历了影响世界格局的重大历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8辑

史事件,例如十字军东征,穆斯林势力在军事上成功战胜了基督教会等。与此同时,中世纪犹太人所面临的历史处境也迫使他们反省自身的民族认同、历史处境和未来发展,从而产生新的历史认知和历史书写动机,构建了中世纪犹太人的历史认知世界。